

南亚的战略重要性与中国的南亚战略

楼春豪 张明明

[内容提要]南亚是中国睦邻外交重点、和平崛起的西部依托带及边陲稳定与发展的联动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南亚格局进入大变革和大调整阶段,印度崛起、反恐战争、大国博弈等都对中国在南亚战略构成新的挑战。中国未来的南亚外交应多管齐下,稳中求进,以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大局,并带动南亚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 南亚战略 睦邻外交 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楼春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所助研,主要从事印度和尼泊尔研究;张明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8级硕士生,主要从事国际恐怖主义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妥善应对国际热点、天灾疾病、金融危机等挑战,与大国关系稳中有升,对亚非拉外交有声有色,在多边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是,中国对南亚外交略显滞后,高层互访的频度、经贸合作的深度和人文交流的力度,都与南亚重要的地缘意义不相匹配。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南亚是外交政策“四合一”地区:5个国家与中国接壤,属中国陆上邻国最多的地区,属于“周边”;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崛起势头明显,头顶“金砖贵族”、“世界办公室”等光环,可划入“大国”行列;印度并未完全崛起,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均属“第三世界”;中国是南亚区域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的观察员,印度、孟加拉是“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BCIM)倡议国,此为“多边舞台”。然而,中国外交过去对南亚的重视程度不够,中国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南亚,多管齐下加大对该地区的经营力度,与区域国家共同打造“和谐南亚”。

—

长期以来,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地理阻隔,加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曲折、对周边政策侧重东北亚和东盟,中国对南亚的外交投入相对不足,或者说突破较少。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边疆安全问

题的突出、东亚局势的相对稳定,南亚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中长期甚至有可能超过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

首先,在中国的大周边,南亚逐渐成为局势最为复杂的地区,是中国推进睦邻外交、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与难点。与其他主要大国相比,中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周边环境。朝核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尚未解决;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日本等拥有不同程度的核能力;与日本、俄罗斯、印度、越南发生过军事冲突,与印度、日本、越南等存在领土或领海争端。但是,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周边外交成绩喜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中日韩峰会的召开、中国-中亚石油管道的建设,表明中国外交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等方向都有突破性进展。环顾四周,南亚形势最为复杂,印巴纠葛、印-巴-阿三角矛盾、各国发展的普遍滞后,这一切都不符合中国睦邻外交与和谐周边的目标,甚至正在成为中国睦邻外交的最大挑战。有鉴于此,能否处理好中印关系、深化中巴友谊、促进南亚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睦邻外交的成败。

在中印关系方面,两国都是新兴大国,在气候变化、多哈回合、国际体系改革等领域有不少共识。但是,两国在边境、西藏、互信、贸易平衡等问题上存在

诸多矛盾。历史上,两个邻国的共同崛起不时引发竞争、冲突甚至战争。如今中印能否超越历史轮回、实现同步和平崛起,无疑是中国外交急需解决的重点课题。某种程度上,崛起的印度将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邻国,中印关系稳定,西部边境才有可能稳定,否则,和谐周边无从谈起。在中巴关系方面,巴基斯坦自从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后,政治、经济、安全局势每况愈下,有人甚至抛出“巴基斯坦沦为失败国家”的论调。但是,中巴友好关系根深蒂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战略支柱国家。当前巴局势的恶化对中国非常不利。巴对中国援助的期待提高,但中国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助巴彻底脱困。美国、印度等则借口“中巴特殊关系”,推动中国在巴基斯坦问题上扮演更多角色,甚至试图借中国之手压巴配合美、印反恐,欲拉中国掉入“责任”陷阱和违背不干涉内政原则。巴能否走出困境,与中国国际形象、战略利益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在中巴印三边关系方面,印巴曾经长期相互敌视,一度开启的和平进程在 2008 年“11·26”孟买恐怖袭击后中断,目前双方关系并未完全“融冰转暖”。中国在对印巴关系中左右为难,一方面,中国发展对印关系,可能引起巴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深化对巴合作,又使印猜忌“中巴联手抗印”。如果印巴继续对峙,中国南亚外交就难有大作为。就南亚整体而言,当前各国普遍发展缓慢,巴基斯坦、阿富汗深陷反恐泥塘,尼泊尔受困于国内政治乱局,斯里兰卡战后重建任重道远。中国睦邻外交的重要支柱是“经济上富邻”。只有邻国的共同繁荣发展,才能为中国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一个发展缓慢、乱象丛生的南亚,不符合睦邻政策的要求与目标。

其次,南亚地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交接点,南濒印度洋,地缘上直接攸关中国的“通道安全”。无论在陆路还是海洋,南亚和印度洋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通道。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明显增强,成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¹ 中国往来海外的“通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印度洋涉及中国的贸易通道、能源通道和战略通道安全等,它是中国与欧美、中东、非洲、拉美的主

要海上贸易航线,“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航线是中国海上贸易航线的咽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生命线’”;² 中东、海湾地区、西非是中国石油主要来源地区,中国 85% 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印度洋;由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受制于美、日,南中国海问题短期难以解决,印度洋是中国突破美军太平洋岛链、求解马六甲困局的重要通道,是走向海洋的理想选择和打造蓝水海军的试验田。目前,南亚和印度洋通道安全的内涵进一步延伸,又涉及打击海盗、探索海底资源和进行远洋科考等。

当前,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通道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传统安全领域,印度继续坚持“印度洋是印度后院”的军事学说,并通过与环印度洋国家的军事合作,巩固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美国将印度洋作为应对诸多棘手问题(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打击海盗等)的重要基地,在印度洋保持较强的军事存在;环印度洋国家关系复杂,包括伊核问题、巴以冲突、印巴矛盾、斯里兰卡战后重建、缅甸民主化、东部非洲的内乱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印度洋是海盗最为猖獗的地区,是毒品、武器走私的重要航线,“涵盖从撒哈拉沙漠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整个‘伊斯兰之弧’”。中国初步具备了一些通行南亚和印度洋、保障通道安全的条件。中国与巴、斯、孟加拉等国关系良好,在多个国家修建民用港口,影响力日益延伸;海盗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与印度、美国等国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美国在南亚势力增强,不希望印将印度洋据为己有,为中国进入印度洋提供了可能。因此,大力发展对南亚外交有助于中国参与南亚事务、确保印度洋通道的安全。

再次,南亚毗邻中国大西部,直接关乎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放步伐加快、两岸关系相对缓和及海外“疆独”、“藏独”势力在国内策划骚乱,中国国家安全重心“由东南转

¹ 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 11 期,第 27 页。

² 王历荣:“印度洋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战略”,《南亚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47 页。

³ 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21st Century: Power Ph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 p 13.

向西北”¹。因此, 南亚对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以及促进西部开发的“共同发展”、打击毒品的社会整治行动都离不开南亚。

南亚对中国西部安全影响最大之处是在打击“疆独”、“藏独”分裂势力方面。2008年“3·14”事件及随后干扰奥运火炬传递活动, 引起国人对欧美“藏独”和“援藏”势力的关注; 2009年的“7·5”事件将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维会”险恶面目暴露无遗。在欧美之外, 南亚也是海外“疆独”、“藏独”势力的重要聚居地和活动地。“新疆问题”的外部乱源不在南亚, 但鼓吹武力分裂新疆的“东突”势力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部落区皆有存在。2003年10月, 巴军队在清剿“基地”残余时击毙的艾山·买合苏木就是中国政府在全球通缉的11名“东突恐怖分子”之一。“西藏问题”与南亚的关联性更加复杂, 10余万海外流亡藏人定居印度和尼泊尔, 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设在印度达兰萨拉, 尼泊尔是境外“藏独”分子向中国境内渗透的主要通道。虽然印度、尼泊尔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 但南亚地区的“藏独”势力在各种力量的怂恿下仍然非常活跃。

中国西部大开发能否成功, 除国内政策的顺利执行外, 还有赖于周边环境的改善, 涉及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目前, 中国与东南亚、中亚的区域开发合作相对顺利, 与南亚的区域合作略显落后。实际上, 中国与南盟的经济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大有裨益。南亚矿产资源丰富, 包括巴基斯坦的煤、铁, 阿富汗的铜等, 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急需的资源。双方实行相互开放的经贸政策, 有利于挖掘互补优势, 促进经济发展。有学者以西藏为例指出, “西藏发展滞后于东部、中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 地处内陆、交通不便, 封闭半封闭状况长期持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西藏大开发如不能有效改变这种状态, 势必影响到大开发的实际效果, 而西藏的对外开放, 尤其是对毗邻的周边国际市场的开放, 则是打破封闭半封闭状况和促进大开发的有效途径。”² 2006年, 中国正式成为南盟观察员, 为中国-南盟的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

力, 有助于西藏、新疆、四川、云南等省和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尽管边境口岸地区是国外分裂势力易渗透的地区, 也曾发生过分裂势力带入宣传品进行鼓动的情况, 但在已开发的边境口岸地区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此外, 南亚还是毒品重要生产地和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特别是在阿富汗, 战乱长年难消, 毒品问题日益严峻, 外溢到新疆等地的风险增大。有学者认为, “自2005年起, 从阿富汗经巴基斯坦或中亚国家到中国印度的新的海洛因输出线路已经出现”³。“阿富汗毒品从印度扩散至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中国是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受害国之一”⁴。经南亚地区输入的毒品对中国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的冲击已然显现, 高度关注并严厉打击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当前, 南亚地区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热点问题突出, 特别是美国反恐战线东移、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上升和域外大国博弈加剧, 给中国的南亚睦邻外交带来了机遇, 也提出了挑战。

第一, 美国反恐战线东移, 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也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合作诉求。布什任内后期, 由于伊拉克安全局势好转、印巴阿恐怖袭击却日益严重, “基地”藏身的巴、阿部落区安全局势恶化, 美酝酿反恐战线东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从伊拉克撤军并增兵阿富汗, 出台“阿巴反恐新战略”, 明确将反恐重心移至南亚。美国短期难以走出南亚

¹ 方德豪: “中国: 战略热点由东南移向西北”, 亚洲时报在线,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754&catid=189%3A2009-03-19-06-15-48&Itemid=110。(上网时间: 2010年1月16日)

² 陈继东: 《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及其特殊性研究》, 巴蜀书社, 2003年, 第98页。

³ 罗绒战堆: “西藏商贸调查”, 《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72页。转引自陈继东: 《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及其特殊性研究》, 第115页。

⁴ “New Measures Against the Afghan Opium Tsunami”,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署网站, <http://www.unodc.org/unodc/en/press/releases/2007-10-31.html>。(上网时间: 2009年12月25日)

⁵ 邵育群: “阿富汗毒品问题及相关国际合作”, 《现代国际关系》, 2009年第1期, 第36、37页。

反恐泥塘,对中国的合作诉求不断增加。与伊拉克不同,南亚地区宗教、民族矛盾复杂,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印、巴、阿、斯、孟等国都饱受恐怖主义之害。因此,美国反恐战线东移既非南亚恐怖主义猖獗的根源,也非最终解决之道。¹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自身实力的下降和深陷阿富汗反恐泥淖的事实,迫使其提出“多伙伴关系”、“巧实力”等概念,更多寻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支持。其中,寻求中国支持很可能是美最佳选择。因为,美国不希望印借反恐之名打压巴以致进一步主导南亚事务;巴是决定反恐战争成败的关键国家,但印巴严重缺乏政治互信,美不希望给巴留下“美印联合压巴”的认知;美俄在中亚、东欧等地的博弈加剧,美不希望俄影响力南下至印度洋。因此,美国希望中国在南亚反恐中扮演三种角色:利用与巴的特殊关系,压巴“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开放中阿边境的空军基地或过境走廊,为美军向阿运输物资提供便利;更多参与阿经济建设,使中国成为阿安全的“利益攸关方”,以软性手段逐步将中国拉入阿富汗事务。

与此同时,美国反恐战线东移使中国在西部面临的安全压力和在南亚开展外交的难度增大。中国最大的压力是,在缺乏完全互信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边境大量驻军。美国反恐重心东移“是由恐怖主义威胁的现实和美国谋取地缘政治优势的战略需要决定的”,“奥巴马政府仍将把维护和强化美国‘一超独霸’地位作为美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²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是其越战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周边大规模部署军事存在,对中国西线安全明显构成压力。此外,美国的巴阿反恐新战略,将促使更多的国际恐怖分子转战南亚,将南亚作为恐怖主义大战场。国会研究报告称,鉴于“基地”组织在巴、阿部落区的影响力上升和伊拉克“基地”等组织的骨干加盟,“基地”组织在南亚的根基势必进一步巩固。³ 这将加速南亚恐怖势力的外溢,特别是“东突”分子可能会加紧向国际恐怖势力靠拢,将国际恐怖主义的祸水引向中国境内。再有,“鉴于印巴两国长期不睦,印度很可能成为巴、阿部落区恐怖主义外溢的首选阵地”,“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反恐东移步伐的加快,印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将进一步上升,印巴矛盾

因此会进一步激化”,⁴ 从而加大中国平衡与印巴关系的难度。

第二,印度崛起势头迅猛,为同属新兴大国的中国提供了合作契机,同时可能使印度在对华政策上更趋强硬。印度一直以南亚霸主自居,巴则是唯一与其直接对抗过的南亚国家。但印度在三次印巴战争中取胜,肢解了巴基斯坦,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实行经济自由化而加速崛起、实力不断增强,其他国家却陷入内忧外患,从而使南亚地区的力量结构继续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倾斜。

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具有很多相似的国家特质,印度崛起为两国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机会。当前,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的最重大变革,就是“金砖四国”代表的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中印都在努力实现各自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许多改革发展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在推动国际体系民主化方面,两国都承担着改革现有体系、使之更符合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现实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任。未来,国际体系“将更多地反映‘非泛欧’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愈来愈接近‘全球共主’型的、真正的全球体系”。⁵ 而在这个“非泛欧国家”的群体里,中国和印度无疑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方面,中国和印度在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多哈回合谈判、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越来越多地进行沟通、磋商和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此外,面对西方世界“普世价值”的渗透,中印两国在保持和发展各自文明特色、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并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

¹ 刘青建:“试析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局”,《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 2期,第 7页。

² Geoff Dyer “Obama is likely to press for greater Chinese involvement”, November 13 200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692/en> (上网时间:2009年 12月 25日)

³ 刘青建:“试析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局”,《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 2期,第 12页。

⁴ Kenneth Katzman “Al Qaeda in Iraq: Assessment and Outside Link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updated August 15 2008 <http://www.fas.org/sgp/crs/terror/RL32217.pdf> (上网时间:2010年 1月 15日)

⁵ 李莉:“美国反恐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 2期,第 18页。

⁶ 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 6期,第 5页。

不过,也要看到,印度对华心态复杂、敏感,在自身国力增长的推动下,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印度面对中国的崛起具有“自卑”与“自负”的双重心理。1962年边境冲突的阴影、中国经济超速发展的压力加上对中国与南亚小国交好的疑虑,都使得印度以不信任、担忧甚至恐惧的心态审视中国。同时,印度认为自己将由南亚霸主跃升为世界大国,并为自己的古老文明、全球最大民主国家地位等感到自豪,因而不时显露出自负心理。¹ 目前,中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心理而呈现出“双层结构”态势。一方面,双方领导人和政府都认识到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在许多问题上的共识增加;另一方面,双边关系中的竞争面凸显,边境、西藏等问题短期难以得到解决,媒体炒作双边矛盾对决策者构成强大民意压力。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南亚地区霸主地位的巩固,印度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自负,进而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2009年以来,印度领导人频繁访问藏南地区(印称“阿鲁纳恰尔邦”),并在中印边境地区增兵和大兴土木,甚至默许达赖喇嘛访问争议领土的核心地区达旺,都显露出印度对华态度趋向强硬的苗头。

第三,主要大国纷纷布局南亚,既为中国提供外交拓展的机会,又增加了中国外交实践难度。南亚变局牵动新一轮大国博弈,南亚由此成为新的大国竞争场所。美国“反恐谋霸”,对南亚事务的影响力可以说达到历史顶点²;俄积极构建以印、阿为基点的南亚战略,巩固俄印同盟,支持卡尔扎伊政权;伊朗利用地缘、语言、宗教优势,推行更加积极的“东进政策”;印多管齐下经营阿富汗,试图掏空巴的战略后方;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以塔吉克斯坦为首的中亚国家,也纷纷利用各种渠道,加大对南亚投入。这些对中国的南亚外交造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它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南亚事务的机遇。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延伸,带来外交、安全利益在该地区的扩展。角逐于南亚战略场的其他大国意图不尽相同,为中国进入南亚提供了可能性。最典型的是,由于美国在南亚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和印度在南亚的主导权之争逐渐显现。

现在的南亚已经分为“美国主导的南亚”与“印度主导的南亚”,前者包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后者指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不丹。故而,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时两国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提出“欢迎一切有助于南亚和平、稳定、发展的努力”,“愿就南亚问题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³后,印度国内充满质疑与反对之声。实际上,美俄、美伊(朗)、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印度与伊斯兰国家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彼此间的博弈为恪守不干涉内政的中国提供了参与协调、合作的多种契机。

另一方面,它增加了中国的南亚外交在议题选择、参与程度及合作对象选择等方面的难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阿富汗事务上,中国希望为阿的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但同时也警惕被美国拖入陷阱。正如评论所言,“中国近代始终坚守‘不干涉内政’、‘韬光养晦’等基本原则,在国际社会也以多边主义交往为立国原则,如果成为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协力伙伴,等于这些原则全都放弃,中俄关系、中国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友谊必将受损,其中伤害最大的,乃是与伊斯兰国家的友谊”⁴。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一旦在推进南亚外交时处理不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或南亚地区。因此,大国力量的介入,需要中国更加审慎地参与南亚事务,而在何种条件和时机下参与、以何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将是难点所在。

¹ 印度领导人在进行中印对比时,经常以“民主大国”自居。最近的一次表态,是2009年11月23日辛格总理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答问。辛格称,“中国的经济表现确实比印度亮丽。但还有一些远比国内生产总值(GDP)更重要的价值理念,如尊重基本人权、实行法治、维护多元文化、保障不同种族和宗教的权利,这些都是重要的价值理念”。“虽然印度的GDP增长可能不如中国,我绝对不会选择中国道路。我会倾向于坚持印度模式”。“与非民主国家(中国)少数统治者推动的改革相比,一旦民主国家基于广泛共识做出决定,其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将更具持久力、更加有效”。“PM's addres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 23, 2009, 印度外交部网站, <http://meandia.nic.in/>。(上网时间:2010年1月16日)

² 2008年“11·26”孟买恐怖袭击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度紧张到剑拔弩张的程度,美国高官穿梭两国予以调解,力压双方保持克制,最终使得印巴对峙有惊无险。虽然核武器在抑制印巴双方采取激进行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美国的外交施压无疑也是重要因素。

³ 《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⁴ “中国允许美军借道新疆利弊”,《亚洲周刊》,2009年12月27日,第5页。

三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应加大在南亚地区的外交力度,在加强与南亚关系的同时,积极促进南亚的稳定与繁荣。

第一,要高瞻远瞩,谋划长远,切实加大对南亚的工作力度。南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关系到西部边疆的稳定与繁荣,关系到中国西进中亚、南下印度洋的战略利益,地缘意义重大。未来,中国应配合构建和谐周边、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内外政策,加大对南亚的战略投入。其中,比较切实可行的措施包括: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出台南亚战略,使南亚外交细化、实化、系统化和机制化;加强中央部门间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沟通渠道,增加中央涉外部门中从事南亚工作的人才配置;如果南亚局势继续恶化,可考虑选人出任南亚特使,直接参与棘手问题的解决。

第二,要深化经贸合作,使之成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与压舱石。中国与南亚的经贸合作整体落后,但潜力巨大。南亚各国经济潜能尚未开发,如尼泊尔是全球水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已开发的水电资源不足 1%¹;巴煤炭资源储量位居全球第四,但缺乏相关开采技术,每年反而进口大量煤矿²。中国应发挥自身优势,使南亚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为此,首先应该鼓励信誉好、有拳头产品、行业社会效益高的企业赴南亚各国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矿业开采、电力开发等;其次要充分利用户双方产品的互补性,以关税和边贸为杠杆,带动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再次要重点发展边境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边境地区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建设,将中国-南亚经贸合作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此外,鉴于当前南亚局势并未落稳,相关部门应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并反馈至企业和商会,形成官商良性互动。

第三,立足南亚力量格局现实,处理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一方面,要与美国在南亚事务上加强合作。美国实力虽然有所衰退,但其在南亚的影响力却有所增强。中国和美国都是南亚域外大国,在南亚事务中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应在坚持基本外交

原则的基础上,就南亚事务与美国进行充分、详尽的讨论。另一方面,要平衡对印、对巴关系。中国应努力发展新形势下的中印合作,通过扩大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消减印度在地区、双边问题上的对华疑虑,增强双方政治互信;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建立派驻代表的磋商机制,在双方重大的关切和利益问题上加强磋商。同时,中国应坚持对巴关系的战略支柱地位,继续向巴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强中巴政治、经贸、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在重大问题上为巴仗义执言。中国在与其它南亚国家发展关系时,也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更多地关注对方的发展问题,必要时提供务实、管用和具有造血功能的援助。

第四,重视具体领域的合作,以功能性合作带动全面合作。中国应该基于各国具体国情,推动与各国的功能性合作,先从农业、扶贫、防涝防旱、紧急救灾、水资源利用等低政治领域起步,然后逐步扩展到反恐、打击毒品犯罪等高政治领域。其间,应重视发挥南盟的平台作用,推动南盟内部的功能性合作。

第五,加强南亚研究,为中国的南亚外交提供智力支持。中国的南亚研究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若干问题,如:研究梯队断档、中年骨干人才不敷需要、政策研究力量弱于学院派力量;研究重点失衡、重视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研究、忽略小国研究等。今后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为此,应该加强相关语种人才的培养,鼓励更多学科背景的人才从事南亚研究;完善研究“光谱”,将国别研究从印、巴研究扩展到区域内所有国家,推动反恐、反分裂、区域一体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等问题研究;将北京、上海、四川和云南作为四大南亚研究基地,并逐步带动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上述四大基地的研究工作应基于自身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如四川和云南两地可注重经贸合作、边境安全等研究。此外,还应理顺官、商、产、学、研的合作关系,确保研究服从现实、服务于现实。○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数据, <http://www.state.gov/r/pa/ei/bgn/5283.htm>。(上网时间,2010年1月18日)

² 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资料, <http://www.gsp.gov.pk/resources/seninars2.htm>。(上网时间,2010年1月20日)